法国史学革命：
年鉴学派，1929—1989

彼得·伯克　著
刘　永　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49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 /（英）伯克（Burke，P.）著；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ISBN 7-301-11009-X

Ⅰ.法…　Ⅱ.①伯…②刘…　Ⅲ.史学史-法国-1929～1989
Ⅳ.K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0055 号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The Annales School，1929-1989
by Peter Burke
Copyright © Peter Burke，1999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Cambridge

书　　名：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
著作责任者：（英）彼得·伯克　著　刘永华　译
责 任 编 辑：岳秀坤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11009-X/K·0455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1 印张　178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费雷、夏蒂埃、雷维尔：
“超越年鉴派”(代译序)　刘永华 / Ⅰ

鸣谢 /1

导论 /1

第一章　历史编撰学旧体制及其批评者 /1
第二章　创建者：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 /6
　一　早期岁月 /6
　二　斯特拉斯堡 /10
　三　《年鉴》的创办 /15
　四　年鉴派的制度化 /20
第三章　布罗代尔的时代 /27
　一　《地中海》 /27
　二　后期布罗代尔 /37
　三　计量史学的兴起 /48
第四章　第三代 /60
　一　从地窖到顶楼 /62
　二　系列史的“第三层面” /68
　三　反动：人类学、政治、叙事 /73
第五章　全球视野下的年鉴派 /88
　一　接纳年鉴派 /88
　二　结清账目 /99

术语表　年鉴派的语言 /105
参考文献 /110
索引 /135

鸣　谢

不消说，这一研究得益于与年鉴派成员，尤其是与费尔南·布罗代尔、埃马努尔·勒华拉杜里、雅克·勒高夫、米歇尔·伏维尔、克兹斯托夫·波米安、罗杰·夏蒂埃与雅克·雷维尔进行的会谈。会谈的地点有巴黎，也包括了从塔吉·马哈陵到伊曼纽尔学院在内的更富异国情调之地。

我想感谢我的妻子玛丽亚·露西娅、我的出版商约翰·汤普森和罗杰·夏蒂埃，感谢他们对本书初稿提出的意见。我也受惠于璜·玛瓜希卡。大约三十年前，他点燃了我对年鉴派的热情。我还得益于与亚伦·贝克、诺曼·伯鲍姆、约翰·波西、斯图亚特·克拉克、罗伯特·达恩顿、克利福德·戴维斯、纳塔莉·戴维斯、加维尔·吉尔·普约尔、卡罗·金兹堡、拉纳吉特·古哈、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加伯·克拉尼扎伊、杰佛里·帕克、圭因·普林斯、卡罗斯·马提涅兹·萧、伊沃·萧佛、亨克·维斯林等人的交流。跟我一样，他们力求在与年鉴派打交道的同时，与它保持一定距离。

费雷、夏蒂埃、雷维尔："超越年鉴派"(代译序)

刘永华

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派，1929—1989》(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The Annales School，1929-1989)一书，1990年列入《当代重要思想家》(Key Contemporary Thinkers)丛书，由英国剑桥Polity出版社刊行。该书是继美国史学家特莱恩·斯托恩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的《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派范式》(French Historical Method：The Annales Paradigm，1976)之后[①]，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评价年鉴派的又一部力作。该书考察了1929至1989年六十年间，法国史学年鉴派创建、发展、转型的基本轨迹，至今仍是国际史学界介绍、评价年鉴派学术成就的最佳入门书。[②]

自伯克该书刊行以来，国际史坛发生了不少变化。继年

---

① Traian Stoianovich，French Historical Method：The Annales Paradig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

② 目前英语世界介绍年鉴派的书籍，比较重要的有：(1) Robert Forster and Orest Ranum，eds.，Selections from the Annales 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1979).该书为系列出版物，分集译介《年鉴》杂志刊出的重要论文，第一至五集的主题分别是：a. Biology of Man in History；b. Family and Society；c. Rural Society in France；d. Deviants and the Abandoned in French Society；e. Food and Drink in History；(2) Jacques Revel and Lynn Hunt，eds.，Histories：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New York：The New Press，1995).这是由年鉴派新秀与美国新文化史倡导者合编的一个文集，所收文章以年鉴派学人所著为主，同时也收入其他学者对年鉴派的重要评论，或是对年鉴派有重要影响的论文；(3) Stuart Clark，ed.，The Annales School (New York：Routledge，1999).此书由英国史学家所编，共四卷，主题分别是总论(Histories and Overviews)、年鉴派与史学研究(The Annales School and Historical Studies)、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布洛赫及其他年鉴史学家(Marc Bloch and Other Annales Historian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鉴派之后,在意大利兴起了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德国出现了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美国学者则力倡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尽管这些史学流派并不是到90年代才出现,有的甚至可追溯至70年代(如微观史学),但近十几年以来在国际史坛日益引人注目[①],对年鉴派产生不小的冲击。同时,年鉴派本身也经历了不小的变化,对其学术传统的反思,可说成了年鉴一代学人的"过关礼俗"(rite of passage),年鉴派早期的基本信条受到了质疑;1994年,《年鉴》杂志从原来的《经济、社会、文明年鉴》(Annales:économique,sociétés,civilisations)改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Annales: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如何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重新思考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一时成为讨论的焦点。因此,有必要对近二十年来年鉴派的基本进展进行总结和评论。由于学识所限,这里主要围绕年鉴派八九十年代三个重要的文本及相关研究,对这些新进展进行初步的评论,以期指明八九十年代以来年鉴派进展的三个面向。这三个文本分别是:(1)费雷的"超越年鉴派"(1983);(2)夏蒂埃的"作为表象的世界"(1989);(3)雷维尔的"微观分析与社会的构建"(1995)。

一 费雷:重新认识政治史

这篇序文的标题"超越年鉴派",实际上来自年鉴派第三代史学家弗兰索瓦·费雷(一译傅勒,Fran ois Furet,1927—1997)撰写的一篇论文的题目。《超越年鉴派》一文本是费雷为他的论文集《在史学作坊里》(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英文版撰写的导论,在该书出版的前一年(1983),先行发表于美国《近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上。[②]文章以作者在《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 aise,1978;英文版:Interpreting

① 参见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ge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尤其是第三部分。

② Fran ois Furet, 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 trans. Jonathan Mandelbau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Furet, "Beyond the Annale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5 (Sept. 1983), pp. 389-410.



the French Revolution,1981)中提出的观点为基础[①],对费弗尔与布洛赫开创的年鉴派学术传统进行了反思。

作为年鉴派第三代的中坚人物,费雷曾于1977—1982年间担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第二任院长,1997年去世那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由这样一位中坚人物,对自身扎根其中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与批判,初看之下,不免唐突。细细想来,却又觉得其来有自。与第三代年鉴派许多杰出学人(如勒高夫、杜比、勒华拉杜里)不同,费雷专攻的时段既不是中世纪史,也不是近代早期史;他专攻的领域既不是社会经济史,也不是心态史。他毕生关注的问题是法国大革命史,这本是传统政治史学的堡垒,费雷却要用“新史学”的方法,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同时,撰写《超越年鉴派》这篇文章时,作者应尚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任上,因此有必要反思布罗代尔倡导的“总体史”传统,重新考虑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因缘,最后让他成为年鉴派第三代史学家中最具批判性的人物之一。

从19世纪开始,西方史学界已就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广泛讨论,已形成传统史学、社会史等数家自成一体的分析,费雷对这些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大致继承了年鉴派前辈们的观点。在费雷看来,传统史学的主要特点,“并不在于它是一种‘事件史’,甚或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史;因为从定义上说,对过去的每一项研究都在重构‘事件’,在何种事实应奉为‘事件’与何种不应奉为‘事件’之间,并无逻辑标准可言”。传统史学最为普遍的特征,“是认为阶段比研究的问题更为重要,对某一‘时段’的研究确立了这种优先性后,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增加新事实,或是纠正对该时段历史变迁的诠释”。从这种意义上说,“史学家成为风格画家:他获得架构(亦即时段)与主题(亦即他在该时段内所选择的东西)的途径,主要是巧合而不是学术努力。不过,架构与主题根本没

①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Elborg F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中译本: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

有让我们了解他的手艺,这是他的技艺的真正的秘密。”对传统叙事史学家而言,“这一手艺并不在于去想像在至今被视为独立的几套事件之间的关系,或是在于向已知事件提出新的问题。他的首要目标是借助其叙事的魔术,让遗失在之前人们从未重新读过的旧手稿之中所有的生命、思想与感情起死回生。”[①]英国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对大革命的研究,便是费雷心目中传统史学的一个典型。

在实证研究中,传统史学对档案尤其是地方档案情有独钟。传统史学家相信,通过对档案内容进行耐心细致的考察,他们将找到研究主题。这不仅意味着,史学家在事件或是诠释上犹豫不决时,文献本身有着决定权;“从更深的层面上说,这意味着研究者挖掘的档案,对决定其研究的内容与视野负有最终的责任”[②]。从最隐性的层面上说,这样一种史学将档案文献视为文化区分的工具,史学家通过这一工具,可以像人类学家那样,神游于“异国他乡”,最终习得他者的生活方式。这一史观对社会变迁与现代性了无兴趣,费雷笔锋所向,已不单是科布本人,而且将所有牛津学人尽数包括在内。同时,这种史学关心的是“重构”(reconstituting)而不是“诠释”(interpreting)历史,它试图逃避方法与理论,实际上则是徒劳无功。因为史学家与档案之间的对话,本身根本无法给他提供主题。这一对话在本质上必然为前人的学术选择所左右,要不然其成果“充其量只是未刊逸事汇编’而已。[③]

由于以科布为代表的这种史学试图逃避理论,它最终求助于文学的叙事笔法。科布仅仅对个人而不是社群有兴趣,费雷援引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说法,认为这是因为“作为贵族文明的造物”,英国人“着迷于特例、具体和特别的个体”;与此相反,民主平等“将人们引向概括,引向构建适用于个体的阶级——假如不是全人类——的抽象的评判或法则”。如何将这些个体组织起来呢?唯一的原则是“人类存在的随意性、

① Furet,“Beyond the Annales,”p.400.
② Ibid.,p.401.
③ Ibid.,p.402.



时间的流逝或是生活故事"[①]。自然,叙事成了这种史学的基本构件。与此前倡导叙事史复兴的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不同[②],费雷认为叙事是"一种有点懒惰的历史写作方式,因为从定义上说,它逃避问题,在时间流逝的魔术中,将事实与观点混为一谈"[③],最终对人类知识的增量毫无贡献。在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中,很清楚,作者是在为其倡导的"问题导向史"(problem-oriented history)或是"概念化史学"(conceptual history)张本。

如果说传统史学有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么社会史的情况如何呢?费雷认为,传统史学是"重构史学"(history-as-reconstitution),而当时流行的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化史学"(history-as-a-social-science)。后者是 20 世纪史学的主流,年鉴派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尽管费雷否认存在所谓的年鉴派史学,他还是认为这一"学派"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看法:一方面,史学必须通过向兄弟学科借用研究主题与方法;另一方面,史学必须是一如既往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学科,具备对社会现象进行最为全面的理解的条件。费雷指出,尽管社会科学化让史学在方法论上更为折中,但它并未保证知识增量,反倒由于扩大了史学领地,让这一学科无形之中变得更为分化。因此,要反思年鉴派学术传统,要对当前史学的困境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新审视 20 世纪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社会科学的宗旨是解释社会事实,并力求提供一个总体的解释。从孔德到涂尔干,社会学家都在坚持说,从社会的角度分析人类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单是对社会决定性因素的分析,就足以为了解人类的"本质"提供钥匙。而结构主义人类学则相信,通过找出千差万别的社会表象背后的常数,可以发现有关人类的整体理论。这些理论的基本预设是,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千差万别的表象背后的常数或通则,这些常数或规则一般是超越时空的,也就是说,是"非历史的"——这里的"历史"当

① Furet,"Beyond the Annales,"p.401,403.

② 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 and Present 85 (Nov.1979),pp.3-24.

③ Furet,"Beyond the Annales,"p.409.不过,这篇文章并未提及斯通其人其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然是特殊性与变迁的代名词。

在社会科学忙于界定自身对象的同时,史学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它声称不再是'历史主义者':它不再将时间标尺视为人类进步阶段的标准。"它不再认为时间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史学转向更为宽泛的论题:"从乍看之下'非历史性的'举止,到客栈的菜谱,再到土地的分割,每件东西都成为历史的。"①由于这一缘故,史学一直面对社会科学,向后者借用理论与方法。但是,史学仍旧野心勃勃,倡导"总体史",以求将社会科学统合于史学之下。不过,"总体史"的内涵并不清楚。"'总体史'仅仅是表达了雄心:要比……社会科学提供更为全面的视野、更为详尽的描述、更为综合的解释。"②在此旗帜下,史学家倡导研究常数,研究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因素或是"结构"。至少,这些因素应该与其他因素一样重要。

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史学家是通过扩大其研究对象,通过至少部分地改变其语言,以达成"对史学内部领域的彻底重组"的。从一开始,这两种变化就是相互连接的。由于任何东西都有历史,在认识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势必向诸如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等专门的社会科学借用概念与方法。但社会科学不仅研究对象不同于史学,而且其语言也有异于史学家熟悉的解释模式,结果"历史编纂学的学术景观"逐渐被改变了。传统史学的解释遵循的是叙事的逻辑。发生在前面的事件为后面的事件提供解释。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的语言受到自然科学语言的影响,其目的是确定常数,描述、研究客观的行为,而不必理睬行动者的复杂动机,不必拘泥于时间的先后顺序。社会科学化史学家视为关键的时间,不再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而是取决于他所感兴趣的问题。他研究的对象持续时间越长越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的语言与"历史主义者的"历史语言纵然不是势如水火,也是时有抵牾。

史学社会科学化的结果,首先是大大拓宽了"历史学家的领地"(勒华

① Furet,"Beyond the Annales," p.393.

② Ibid., p.394.



拉杜里语)。费雷那一代是心态史方兴未艾的时代。但和他的同事勒高夫、杜比等相反,费雷并不看好心态史。他认为心态史的成功,并不在于学术上有何创新,而是法国社会变迁使然。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将法国“粗暴地”从过去撕裂出来,结果是怀旧情绪弥漫整个社会。心态史正好回应了这一怀旧情绪。“它与过去建立联系的途径,主要不是通过一系列特定的问题,而是通过让我们祖先的情绪、信仰与心态世界起死回生的热切欲望。这种史学的秘密首先是情感的秘密。它将过去视为我们现在的镜像,但是这一镜像也就是我们的现在。”一般而言,“它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高卢替代品”。[①]对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借用,只是让新史学拓宽了研究的范围,“并未改变研究的本质”,并未改变“其研究过去的学术路径”。[②]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简单地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有方法,而是必须求助于其他路径,以期重新缔结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政治史便是费雷给出的一个答案。

但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另一个结果,是在抛弃叙事史的同时,将政治史研究边缘化。在传统叙事史中,阶段比分析的对象重要,其解释遵从年代学的逻辑,这是所谓‘历史主义’的逻辑。这正是传统叙事史最为新史学诟病之处。与传统叙事史密切相关的政治史,因其考察的是短时段的事件,被贬入边缘的位置。新史学的首选考察对象是中、长时段的局势与结构。费雷对此颇不以为然。这自然与其研究领域不无关系。法国大革命不同于其他对历史进程无足轻重的事件,这一“事件的社会层面已被其政治层面所吸收、削弱与磨平”,从长时段、结构史的角度讨论大革命可谓困难重重。也许由于这一原因,社会科学化史学才如此谨小慎微地处理这一史学对象。“它不知道如何处理如此短暂的时期,如何把握如此难以化约的事件瀑布,如何避免实际上是自发的年代学——亦即叙事——方法。”[③]

对社会科学化的史学而言,大革命不啻是一种挑战。基于对政治史

① Furet,“Beyond the Annales,”p.405.
② Ibid.,p.394.
③ Ibid.,p.406.

的怀疑,社会科学化史学应该尽量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强调长时段因素在大革命中的作用,贬低大革命在政治、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影响。但是,大革命所造成的断裂,却很难因此而被消解。大革命期间的政治行为尤其难以化约。对大革命的社会史分析,虽然处理的是两个并不相同的问题——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或是大革命广义上的参与者,但是都视政治的、制度的剧变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之间的联系为不言而喻的事实,都相信大革命是将法国史分为旧制度与近代两个时期的政治事件。对大革命的分析,社会科学化史学是捉襟见肘,政治史却是游刃有余。"政治是概率、因此也是自由的典型领域。"政治史"首先是从变迁与进步中观察到的人类自由的叙事"。[①]它尤其适用于对变迁、自由与能动性的分析。至此,费雷的意图已一目了然。

正是从大革命研究出发,费雷重新思考了传统叙事史与社会科学化史学的特征、政治史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及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既然传统叙事史是懒惰的思维方式,而社会科学化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史学研究的本质,史学有必要重新界定其关注的对象,重新思考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费雷的想法是,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必须从两者的不同处着眼。既然社会科学强调常数、结构,强调社会文化对人的制约,史学应转而恢复行动者的决策自由、能动性及历史情境的开放性。在社会科学假定社会行动者仅仅在表达社会运作、再生产的规则,对其所作所为却一无所知之时,史学研究对象中包含的自由决策、能动性成分尤有学术价值。由于史学"是在最接近创造的自由的层面上处理人类行动的",它"是隐含在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的观念中令人误导的简单化与虚幻的缜密的最好的解毒剂"。[②]因此,史学不仅不应忽视政治,而且必须将之置于中心的位置上。

在事隔二十来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费雷在《超越年鉴派》一文中提出的主张,可以发现他对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分析确有几分真知灼见,

① Furet,"Beyond the Annales," p.397.

② Ibid., p.409.



他看到了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当时的局限,看到了社会科学影响下史学话语内部“社会科学话语”与“历史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对当时史学研究的零碎化甚感忧虑,基于这一考虑,他希望通过强调政治史,强调研究自由与能动性,在新的平台上开展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这与下文讨论的微观史学的主张有共通之处。但他对政治领域中自由决策与能动性的过分强调,让能动性与结构性的天平失去了平衡,让人怀疑他眼中的政治人是否生活于社会文化的真空之中。同时,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反感,社会学、人类学已开始思考能动性的问题,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理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倡导的实践的结构主义人类学。① 费雷对能动性与决策的强调,可以说在有意无意间呼应了社会科学界的这一新动向。但是,假如社会科学本身已不再是费雷设想的那个样子,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又该如何展开呢?很可惜,对此,费雷没有给我们答案。看来,要顺着他的路径超越年鉴派的传统,至少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

二 夏蒂埃: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

1988 年,《年鉴》杂志刊发了由编辑部集体撰写的评论文章,题为《历史与社会科学: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宣称历史学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进

---

①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1984 (中译本: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 年);Marshall Sahlins,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Structur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andwich Islands Kingdo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1 (中译本:马歇尔·萨林斯:《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桑威奇群岛王国早期历史中的结构》,刘永华译,收入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张宏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Sahlins,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中译本见上)。

入“普遍危机”时代,吁请学界同仁围绕如何开创史学研究的新阶段展开讨论,文章特别要求学者关注分析的规模与历史写作问题。[①]次年,《年鉴》杂志刊出《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对上述分析作出了回应。[②]作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1945—)现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研究主任,是年鉴派新生代人物,研究近代早期书籍、阅读史的专家。文章结合作者自身的文化史研究,倡导通过重新起用、界定“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这一概念,克服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隔阂与局限。

在《历史与社会科学》一文中,作者对史学危机提出相当矛盾的理解。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出现了普遍危机,具体表现为总体阐释体系的崩溃,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主导性范式”的崩溃,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抛弃。另一方面,他们又否认史学存在危机,认为史学仍是健康的、有生气的。[③]《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首先回顾了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变动,回应了这一诊断。

夏蒂埃认为,在六七十年代,对史学的挑战主要来自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新兴学科。它们对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论提出质疑。对此,史学一方面占领这些学科开拓的新领域,提出新的问题,确立新的研究对象,并向兄弟学科借用概念与方法;另一方面回到年鉴派在 30 年代提出的对“心态工具”的研究。80 年代晚期史学面临的挑战,与上述挑战正好相反。它并非起源于社会科学的挑战,而是发端于对社会科学的挑战,危及了史学研究本身。这种挑战一方面表现为:向主体哲学的回归,否认社会的结构性力量,重新寻求“行动的明确而审慎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政治重要性的强调,即认为政治构成了社会组织的“最为全面的层面”,因而为了解总体的结构提供了一把钥匙。这一挑战要求史学与一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决裂,重新组织其研究对象(更多考虑政治史)、合

① The editors of Annales,“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A Critical Turning Point,”in Revel and Hunt,eds.,Histories,pp.480-483.

② Roger Chartier,“The World as Representation,”in Revel and Hunt,eds.,Histories,pp.544-558.

③ The editors of Annales,“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pp.480-483.

作学科(强调与政治科学与法学理论的对话)及学术原则。从这一角度反观《年鉴》编辑部的诊断,真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是史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退潮,并不能等同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本身的危机,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多半还在强调社会行动者的创新能力而不是结构性的决定因素,强调实践而不是对规则的机械屈从。相反,在历史学的领域,它最基本的理论预设成了问题。①

80 年代晚期史学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科学的危机或是主流范式的更替,而是发端于实际研究视野本身的变化(当然,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科学主流范式的变化,削弱了年鉴派史学主流范式的基础),让过去二三十年史学研究的三个基本信条面临被抛弃的危险,它们分别是总体史、区域史与社会的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② 其结果是,历史学家不得不寻求新的研究起点。放弃总体史方法,意味着史学家在分析社会功能时,不应设定任何教条的实践或时间框架(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的等级,不应强调任何一种因素(技术的、经济的、人口的)的优先性。在分析社会时,这意味着从独特的切入点进入关系网络,将实践与结构视为相互矛盾、彼此竞争的表象的产物。放弃区域史方法,意味着放弃对地理独特性的强调,转而强调常态的因素。至于如何确立常态因素,学界至今聚讼纷纭,一说主张通过统计的手段测量相关性与常数,而微观史学则提出“正常的例外”(the normal exception)一词,以期发现最不平常的现象中最为普遍的事实(讨论见下文)。最后,放弃社会范畴化的方法,意味着不再以社会范畴剪裁文化,重新思考文化产品与实践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夏蒂埃的文章侧重从最后一个角度,讨论了如何克服史学危机,推进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问题。

既然当前的史学危机来源于兄弟社会科学自身,首先必须对史学研究中借用的概念与方法进行分析,清算其中教条、僵化的成分,在新的概

① Chartier,“The World as Representation,”pp.545-547.

② 所谓社会的范畴化的方法,指的是以社会范畴解释文化差异,在社会范畴(如社会阶层)与文化差异(如大传统与小传统、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的研究方法。

念体系与方法论中,为社会史、文化史等新史学的主要领域的寻求出路。为了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与传统的文化社会史做法决裂。具体而言,这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不再在文化差异(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与社会范畴(富人/穷人)之间划等号。因为文化差异无法一一对应于社会范畴,研究者的起点不应是某个社会范畴(阶层),而是从特定的文化形式或对象出发,进而考察它们在流传和使用的社会圈子,这样才能顾及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60年代以来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误区,就是在为民间制作的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划等号,法国史学家芒德鲁(Robert Mandrou)对所谓"蓝皮书库"(la bibliothèque bleue)的研究便是一个典型,夏蒂埃反复申论的是,这些书籍来源复杂,普通民众甚至未必能领会许多书中的内容,并不能将它们等同于民间文化。① 其二,是关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各种历史的、社会的联系。阅读并不仅是个抽象的智力活动,还是个物理行为,应关注读者的共同体(美国接受理论倡导者史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所谓的"诠释共同体"[interpretative community]),比如说,是不是有专人表演文本?阅读的习惯也可能因时因地而有别。其三,是必须区分文本的不同形式。记得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还有个出版者,作者写成书稿后,最终需要出版,而出版者的用纸、对书稿的更改,都可以影响到读者群。②

为了在文化实践与社会范畴之间建立全新的关系,夏蒂埃建议引入"集体表象"概念,以此取代"心态"的概念,并克服客观结构与主观表象之间的对立。集体表象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和莫斯提出的,早年曾对费弗尔和布洛赫产生影响。③ 简单地说,它指的是行动者的认知、分类与象征体系,它直接、间接地影响实践,而实践又是人们构建社会世界的基础。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集体表象与社会世界的联系。首先是从分类与

---

① Roger Chartier,"The Bibliothèque bleue and Popular Reading," in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 Lydia G. Cochra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40-264. 对芒德鲁的蓝皮书库研究的讨论,可参见本书第四章。

② 详见 Chartier,"Texts, Printing, Readings,"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54-175.

③ 参见本书第二章。

社会范畴的观念(认知分类系统,表象的观念化形式)的角度,这是不同社会群体建构相互矛盾的现实的基础;其次是从实践(表象的实践)的角度,这包括意在赢得社会认同的实践,展示得体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实践,以及借助象征手段显示地位和等级的实践;最后是从制度化、物化的形式(表象的象征化形式)的角度,这是表象以看得见的、永久的方式展示群体、社区或是阶级存在的基本途径。

从集体表象出发,史学家在处理社会文化史问题时显得更为得心应手,他们可以集中讨论认同的建构,考察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如何将自身的表象,加之于其他群体的表象之上。他们也可以集中于夏蒂埃所说的“物化的社会构成”,考察不同社会群体的统一性和冲突。这样一来,文化实践与社会范畴之间不再是僵化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进入永恒的对话状态。“通过考察最终围绕社会结构本身的组织及其等级化(hierarchization)展开的表象的斗争,文化史本身摆脱了对单纯致力于经济冲突研究的社会史的过度教条的依赖。同时,通过将焦点集中于象征的策略,集中于它们如何决定立场与关系,如何为每一阶级、群体或是处境构建由认同构成的感知存在(perceived-being),它为社会本身也提供了新的视野。”[①]也就是说,通过关注社会如何在表象的观念、象征与实践中被构建,社会不再是史学分析的当然的出发点,而是成为表象实践的结果,而文化成为不同社会阶级、群体构建认同的场域。结果,社会史与文化史已不再是两个独立领域,而是成了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不再是个凝固的社会群体的总和,它本身是在文化实践中不断构建而成的;同时,文化也不再拥有单一的、清晰的意义,它的意义可能随着不同的时空而转换,对文化的意义的解读本身,成为不同社会群体相互角逐权力和认同的一个重要活动。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史同时也应是文化史,而文化史同时也应是社会史。

夏蒂埃认为,作为一个文化分析的工具,表象概念尤其适用于对旧制

① Chartier,“The World as Representation,”p.55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